



从四个维度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

□ 罗贤宇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海产品消费呈现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趋势，高品质海产品需求增速显著。202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将“蓝色粮仓”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支持发展深远海养殖，建设海上牧场。这标志着我国海洋渔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现代海洋牧场建设目前在装备智能化、产业融合度、品牌附加值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立足大食物观，推动现代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亟须在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等方面实现突破，构建中国特色海洋牧场发展新格局。

“突破瓶颈”：统筹强化现代海洋牧场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引擎，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核心地位，在几个层面整体推进。

创新现代海洋牧场技术联合攻关机制。聚焦制约现代海洋牧场建设的关键领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海洋企业、高校等创新资源，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联合攻关机制。同时，强化防灾减灾技术攻关，突破抗风浪、网衣清洗等“卡脖子”难题，推动海上养殖自动化、智能化、现代化发展。

建设现代海洋牧场装备技术创新平台。整合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生物种质等基础资源，搭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培育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同时，依托联盟搭建装备技术研究平台，促进多功能养殖船、水下机器人、无人船等新型装备技术研发，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引导企业

联合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技术定制、测试检验、产业化开发等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生产力。

“激发活力”：促进现代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为充分释放蓝色经济潜力，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全面推动现代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向纵深发展。

优化海水养殖模式。立足区域资源与设施基础，科学评估环境承载力。因地制宜发展海水鱼、贝类、海藻等特色养殖，合理控制养殖密度与规模。培育当家品种，探索立体化增养殖模式，推行生态健康养殖，推动海水养殖高效化、生态化发展。

升级海产品加工。加强政策扶持，助力企业提升快速锁鲜、冷冻干燥等加工能力，推广智能化调味渗透系统、自动化海上加工船等技术设备，建设智慧化工厂，发展自动化加工生产线，提高加工效率与品质。

构建全产业链溯源体系。整合上下游数据，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打造“全链式”溯源平台，构建数据共享机制，完善“一码溯源”管理，实现海产品全流程可追溯，保障产品质量与安全，助力现代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破圈突围”：培育现代海洋牧场新产业新业态。全方位拓展现代海洋牧场发展空间，需充分发挥“现代海洋牧场+多元业态”的乘数效应，在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塑造发展新动能层面下功夫。

推进“海洋牧场+海上风电”融合发展。构建渔业、能源、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协同机制，科学制定“海洋牧场+海上风电”发展规划与技术标准。推广漂浮式风力发电、柔性直流输电等前沿技术，积极开展新能源高效利用试点。

例如，“国能共享号”项目采用三立柱半潜式基础与养殖网箱共结构融合方案，显著降低了成本。同时，健全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应急预案机制，推动融合发展科学化、规范化。

拓展“海洋牧场+休闲旅游”应用场景。发挥海洋牧场的平台集成功能，推进与休闲垂钓、体育竞技、康乐疗养、研学教育等深度融合。例如，珠海的“低空经济+海钓”模式，通过无人机将钓获的海鲜快速送达餐厅，打造了全新的旅游体验。此外，举办“开渔节”等主题活动，打造“年鱼经济”“节庆经济”等特色品牌，推动渔旅融合发展。

探索“海洋牧场+低空经济”发展模式。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专项资金和产业基金联动机制，引导市场化资金投入。探索无人机在养殖投喂、低空监测、环境监测等环节的应用，构建无人机海上配送网络。例如，珠海的海岛无人物流航线已常态化运营，实现了高值海产品的快速运输。通过这些措施，推动“海洋牧场+低空经济”创新融合发展，为现代海洋牧场注入新活力。

“靶向发力”：创新优化现代海洋牧场服务体系。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元化供给的优质现代海洋牧场社会化服务体系，需全面提升并深化社会化服务对现代海洋牧场建设的支撑作用。

搭建信息平台，促进要素对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搭建现代海洋牧场社会化服务信息平台，整合养殖托管、饲料投喂、加工流通等供需数据。将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服务专业户等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信息及时录入平台，促进生产要素线上对接、线下服务，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实现供求双方有效衔接。

推行“大渔带小渔”模式，实现合作共赢。着力推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渔业合作社+养殖户”合作共赢的新型海洋牧场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利润返还、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方式，带动中小企业、渔业合作社和个体养殖户共同发展，实现“大渔带小渔”，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共享海洋牧场全产业链上的增值收益。

提升金融保险服务质效，注入发展活力。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融资方式，创新运用“政府债券+贷款”“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海洋牧场领域。建立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保险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政银担”“政银保”等合作模式。引导金融机构以现代海洋牧场全产业链为场景，打造多种金融产品，如开发养殖贷、冷链贷以及装备抵押贷款等，为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持续注入活力。同时，保险机构应加强研究利用鱼探仪、水下机器人等先进技术装备，解决海水养殖保险承保理赔过程中验标准、定损难等问题，提升服务质效和风控水平。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湛江分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建立海洋牧场保险全流程风险减量服务体系，实时监测海洋牧场水质、水温等，实现预警提醒、线上理赔等功能。



（上接1版）这种既讲斗争又讲团结的策略，既挫败了分裂势力的阴谋，又向全国人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为先的政治胸怀。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进步青年纷纷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党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进一步提升。

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赢得抗日战争战略上的主动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拥有登高望远的战略优势，这是赢得抗日战争历史主动的关键所在。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更是战略战略的较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空前强大的敌人，面对“亡国论”“速胜论”交织带来的思想混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摆脱被动应对的困境，在战略层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抗战实际深度结合，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武器，科学分析战争形势、精准把握战争规律、灵活制定战略策略，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道路。

在精准分析敌我特点中谋划变被动为主动的结果。战争既是力量的竞赛，又是主观能力的竞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全国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器，“亡国论”者被吓破了胆，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而“速胜论”者则片面幻想通过美英等国的援助，依靠政府军队与日本军队的决战迅速取得胜利。但我们党却提出与“亡国论”“速胜论”迥异的观点。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8年5月，毛泽东用了8天9夜的时间，写出了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在这部伟大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样的分析，得出了“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的结论，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力量。

在预见战争发展阶段中明确变被动为主动的路径。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以线式的阵地防御战阻击日军进攻，结果不断丢失城池。毛泽东则提出通过“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争形式获得“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效果，为我军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竞争特别是战略能力的比较加入到对战争胜败的研判中，准确预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战争形式，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后来，抗战形势的发展和二战的最后胜利完全印证了这一科学预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导，就是战略领导。”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战略领导力，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根本途径，赢得了党内外、国内外一致的高度赞誉。

在制定实施战略战术中实现变被动为主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既有极具战略远见的英明领袖，也有一批能够将领袖提出的大战略转变为实施方略的得力干将，还有能够将高层制定的战略策略贯彻落实到各个层级直至“最后一公里”的严密组织体系和优秀人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赢得历史主动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抗战相持阶段，日军调整侵华战争的战略方针，重点转为在“敌后方实施大胆地奔放不羁地蹂躏作战”，我军抗战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根据《论持久战》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各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加工提炼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与王稼祥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即著名的《建军四号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

和人民武装三部分，提出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为中心，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该指示有力地促进了各根据地军民持久、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加之当时“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学习热潮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基层能够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形成了敌之被动、我之主动的新局面，达成了毛泽东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意图。

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赢得抗日战争精神上的主动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与政治的对抗，更是一场精神与意志的较量。精神上的主动、意志上的坚韧，是赢得抗日战争历史主动的强大动力和丰沛源泉。当日本侵略者试图通过“奴化教育”消解中华民族的英雄血脉与抗争基因时，当战争的残酷考验着全民族的心理防线时，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文化的斗争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根脉相融合，激发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构建起引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旗帜。这种精神引领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更凝聚了跨越地域、阶级的精神共识，让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坚守信仰、在牺牲中砥砺斗志，赢得了抗日战争精神上的主动。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文化的斗争精神为内核，塑造了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培育了精神主动的文化沃土。革命文化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实践，蕴含着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坚韧不拔等内涵要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这种精神融入抗战宣传与实践，通过创办《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撰写《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用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崇高价值追求激励人民爱国奉献、团结抗战。通过组织抗日宣传队、文艺工作团，用话剧、歌曲、诗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抗战必胜的信念传递到敌后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点燃民众的抗争激情。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是率先垂范，在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始终奋战于抗战最前线。革命文化的传播与实践，彻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打破了“恐日”的精神枷锁。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认同为根基，唤醒了全民族的家国情怀，筑牢了精神主动的文化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团结理念，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精神根脉。中国共产党深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将其与抗日救亡的战略需求相结合，阐释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与必然性，论证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文化底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载体。当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以“亲日”为核心的奴化政策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开展“识字运动”“历史教育”等，让民众牢记“自己是中国人”。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不仅抵御了侵略者的文化侵蚀，更让民族大义成为超越地域、阶级的精神纽带，使全民族在保卫中华的共同目标下凝聚起来，为精神主动提供了文化支撑。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刷新了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开拓了精神主动的实践源泉。中国共产党没有将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割裂，而是通过融合创新，创造形成了既具时代性又有民族性的伟大精神。一方面，用革命文化中的平等、民主等理念改造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如在根据地废除男尊女卑，倡导妇女解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实践中焕发新生。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大同等思想丰富革命文化的内涵，如将“为人民服务”与“仁者爱人”相呼应，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和而不同”相契合，让革命文化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这种融合创新形成的新精神，在实践中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量。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勤俭节约、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指引下，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民众在民族大义感召下，放下分歧、携手抗战。这种精神共识转化为行动合力，不仅让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引领得到全民族的认同，更让主动抗战、团结抗战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聚焦人本需求，立足我国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愿景，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对人民日益升级的生态环境需求，近年来北京、浙江、厦门等地，相继印发《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浙江省海岛大花园建设规划（2019—2025）》《厦门市当好生态省建设排头兵加快建设美丽中国样板城市行动方案（2025—2027年）》等文件，以系统思维统筹自然生态各要素保护、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带来了城市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全面变革，赋予了现代化人民城市新的内涵，为新时代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提供了理想模式。

花园城市初衷在于解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花园城市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1898年霍华德出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译者用“田园”的表述旨在引起读者对乡村的联想，注重城乡一体化生态保护。针对工业革命后伦敦人口爆炸性增长与贫民窟污染问题，霍华德提出在大城市外围建设规模可控的花园城市，其中的城乡一体发展、绿色空间植入、限制城市无序扩张等思想，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此后，分散主义、生态城市、生态景观学等理论的兴起，为改善城市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花园城市理念的全球化传播，欧美各国衍生出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英国在伦敦周边推动建设了莱奇沃思、韦林等花园城市试点，以分散伦敦的拥堵压力；新加坡着眼于全岛生态系统的整体建设，经历了“花园城市”向“花园中的城市”“自然之城”的演进，实现了从景观营造到生态文明的跃迁；美国则通过一系列“绿色基础设施法案”，将绿道网络打造为限制城市蔓延边界和串联生态要素的纽带，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社交休闲空间。

具有中国特色的花园城市建设在汲取国际花园城市规划经验之外，还继承中华传统山水文化，形成各类生动实践。中国古典园林文化、自然山水文化、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对营城格局影响深远。从当代实践来看，深圳享誉“国际花园城市”称号，四季繁花、立体绿化展现了独到的城市生态美学。厦门“海上花园城市”融合山、城、湾、海要素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浙江以衢州、丽水为核心建设“大花园”，促进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现代都市与田园乡村相结合。成都公园城市以公园为牵引带动系统保护和绿色发展，促进山水人城融合共生，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扩张发展之路。与成都相比，北京代表了人口密集型地区减量高效发展之路，通过城市更新、腾退换绿、见缝插绿、连接廊道等方式，推动覆盖城乡全域的生态系统保护，塑造绿色空间与城市功能融合、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国首都典范。

理解中国式花园城市的内涵，可把握三个要点：一是生态属性，以城市园林化为起点、以构筑城市生态系统为基础，改善人居环境。二是发展活力，协调自然要素与人工建筑、生态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等关系，由生态功能的提升带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增进，使人身处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同时为城市发展带来活力。三是共建共享，自上而下规划引导与自下而上创新探索相结合，调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力量，凸显人民主体性。

花园城市推动生态保护和城市治理的四重转变。第一，在治理目标上，由增绿扩绿“数量”型导向，转向提升生态获得感、人居环境品质的“质量”型导向。在绿化的基础上推进屋顶、立交桥等彩化、立体化，通过植物色彩搭配设计，丰富城市景观，使自然生态融入日常生活，

向绿而生，花园城市写下生动注脚

□ 薄凡

推窗见绿、开门见景，提高绿视率、彩视率、绿色空间可及性。第二，在治理方法上，由“分散”的生态要素布局，转向“系统”的绿色网络构建，以绿道串联自然要素、人文景观和城市公共服务节点，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城乡全域生态保护修复。第三，在治理目标上，由生态效益的“单一”目标，转向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元”目标。不仅强调扩绿增绿、山水形胜、森拥园簇、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生态属性，还强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融汇、健康安全韧性、多功能花园场景营建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建设花园住宅、花园街镇、花园工厂、花园商圈等，优化城市家具布置，使钢筋水泥转变为“城市森林”，绿色空间衍生出休闲、避险、文化展示等多元功能。第四，在治理主体上，由依靠政府单一营建的城市“管理”，转向多方力量参与、全民共建的城市“治理”。创新投融资模式，借助市场机制、全民共治等方式，汇集政企社区居民多方力量，吸引社会主体参与花园城市运营，在规划建设之余，维持花园城市的可持续运营，营造高品质绿色生活新场景。

花园城市建设落脚于环境民生需求。在守住环境公共产品公益底色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模式和运营模式，衍生出公园经济、观鸟经济、休闲康养、自然研学等新业态新场景。通过绿化认养、绿道骑行、自然研学等活动的开展，使得生态红利可感可知，激发群众参与花园城市建设的内生动力，共建共治共享花园城市，真正实现人人是园丁、处处即花园的景象。

